

in the global discourse of history. The degree to which this is true and the more subtle effects of this on the conceptual underpinnings of global/transnational/translocal/inter-area history could be the subjects of a number of books. The fact that, as the author underscores, “global history” is neither defined nor profitably definable is ironic given that this English phrase has become the source for virtually all renditions (including, as the author notes, Japanese *gurobaru reikishi*) of the genre’s name. There is more to say here, and one hopes that the author will follow his own breadcrumbs to even more stimulating and enlightening work.

PAMELA KYLE CROSSLEY
Dartmouth College

A Northern Alternative: Xue Xuan (1389–1464) and the Hedong School. By Khee Heong Koh.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1. Pp. xiii + 353. \$39.95/£29.95.

本書以明代北方著名思想家薛瑄(1389–1464)及河東學派為研究主題，作者結合思想史、社會史、政治史的多元研究角度，廣泛參照目前學界對於江南地區類似議題的研究成果，透過比較的視野來說明以薛瑄為代表之明代北方學派的特色，以及南北學術發展的差異。

全書共有五章。第一章從明代學術思想史的角度討論薛瑄及北學，在簡短介紹元代與明初的理學家後，說明北學在學術史上的邊緣地位，指出黃宗義的《明儒學案》以王學為主，刻意貶抑薛瑄及河東學派的學術成就。接著介紹薛瑄的生平、為學、仕宦經驗、著作，及其交友網絡。薛瑄是一位自學有成的學者，並無明顯師承，作者認為此是明初北學不同於南方的重要特色。

第二章主要討論薛瑄的思想，尤其是關於薛瑄對道統觀、理氣論、復性觀的看法；作者也強調思想理念與實踐行為的密切關係。本章先說明《讀書錄》的體裁，此書乃薛瑄平日讀書與反思的心得，作者特別強調在理解薛瑄思想時，必須留意《讀書錄》與《讀書續錄》的寫作時間差距二十餘年，兩書所記的重點不盡相同，反映著薛瑄思想的變化。關於道統傳承方面，作者認為薛瑄不強調直接師承關係，此與南方金華學者不同。對於理氣論的討論，作者指出薛瑄強調理氣無先後、始終不離，雖然他的觀點前後期並無大差異，不過後期文獻明顯少談「聚散」的問題，很可能是因為談「氣之聚散、理無聚散」，容易給人理氣有間的印象，故後期較少論及。至於復性觀，是薛瑄思想的核心，薛瑄以復性為成聖之道，也是千古學政與教化之本，作者認為這樣的思想與薛瑄全力支持朝廷官學而沒有建立書院有密切關係。

第三章研究薛瑄的家族及其對家族的看法。作者分別從薛氏家族成員的社會身分、聯姻情況、命名模式、過繼與宗法制度等方面，對於薛氏家族進行細緻的研究，指出無論就政治勢力或宗族組織而言，薛氏家族都不算強大，宗族的活動也不興盛。薛氏子孫也未能承擔起傳遞發揚薛瑄學問的任務，十六世紀修建薛瑄墳墓時，仍主要由地方官主導。另外，作者又根據薛瑄所撰寫的族譜序來分析薛瑄對於家族與修譜的看法。薛瑄肯定士大夫之家通過修譜以收宗收族的作法，他強調修譜要真實，應紀錄祖先的功名宦績，不可忘記家族的榮耀。本章也將薛瑄和曹端的個案，與南方的宋濂、方孝孺、楊士奇作比較，說明薛瑄與曹端都十分重視朝廷，缺少類似南方學者的地方意識。

第四章討論河東學派，以及薛瑄重視官學的教育理念。理學家與書院教育有密切關係，但薛瑄不同，薛瑄全力支持官學，認為科舉既以儒家聖人之學為本，應可與理學理想結合。作者認為這種理念使得薛瑄即使有眾多從學者，仍沒有發展書院教育；本章也進一步透過分析薛瑄撰寫的官學與文廟重修記文，來說明薛瑄的教育理念。另外，本章也考察薛瑄的學術影響，指出他雖不重視學派的建構，然其學術影響跨越了河津地方，延伸到河南、陝西等地。

第五章研究明中晚期對於薛瑄從祀孔廟的討論，除了說明整個事件的歷史過程，也探討明代從祀標準的變化。作者蒐集、分析約一百年間關於奏請薛瑄從祀的文字，分三階段討論：第一階段是成化、弘治年間，從祀的努力失敗，主要因認定薛瑄明道著書不足，不過此時朝廷准設薛瑄之專祠專祀，並刊印薛瑄《讀書錄》。第二階段是嘉靖年間，此時期討論最為豐富，《明實錄》中至少有二十七名官員上疏，二十三人支持從祀，支持者包括程朱學派和陽明學派的官員。作者詳細分析奏疏內容，指出從嘉靖十九年的討論可以看出一個範式的變化，即將從祀資格的討論引到對孔子之道有無功勞上，既然孔子之道在不同時代面臨不同挑戰，因此衡量每個時代儒者功勞的標準也不同，而明儒的成就與功勞則主要在「立德」方面。此時期雖然儒臣中有許多人支持薛瑄從祀，但因為明世宗不同意，仍未能成功。第三階段是隆慶年間，此時期推動薛瑄從祀者主要是程朱學者，並且是在與王陽明從祀的競爭氛圍中進行。隆慶五年奏請從祀薛瑄終獲成功，本章也深入討論從祀事件所涉及的思想、家族、人脈、地緣、政治鬥爭等多重因素。

薛瑄本人的著作與相關史料並不多，作者能夠以薛瑄為核心，完成一本具相當學術內容的專著，主要因為將問題延伸到不同領域，並廣泛蒐集史料，又與其他學者的研究進行比較與對話所致。本書確實相當成功地結合社會史與思想史的研究，第三章對於薛氏家族的研究，充分顯示作者熟稔家族史領域的方法與研究成果；對於薛瑄師友網絡及河東學派傳衍的歷史重建，也顯示作者在史料上用功至勤。第五章對於薛瑄從祀的歷史探討，已完全脫離薛瑄本人，進入明代中晚期複雜的學術與政治關係，十分精彩。簡言之，本書雖以薛瑄與學派意識不明顯的河東學派為主要研究對象，但並未將研究視野侷限在薛瑄的個案，而是透過薛瑄，把議題層次拉到

明代學術史和社會史的範圍，又放入南北比較的視野，進而對理學思想、教育制度、家族活動、學術傳衍及從祀孔廟的政治性進行討論，並試圖藉由說明與江南的差異來凸顯明代北方學術的特色。上述幾個特色及作者清晰的論述能力，都使得本書具有相當可讀性，也是近年來結合思想史與社會史的力作。

以下是我對本書的作法與論點提出的一些想法。一般而言，學者之所以會選擇研究南方宗族、陽明學派、理學家的書院建設，或者研究金華、江西等地方士人從事地方建設、具地方意識等議題，主要因為這些歷史活動在更廣大的社會和歷史中，具有某種創新的意涵，而且目前保留了相當的史料。換言之，並非所有南方的家庭都能夠成功地組織起強而有力的宗族，不是所有南方的學者都有能力建構起醒目的學派、師承或書院教育，也不是所有南方的學者都擁抱地方意識勝於對朝廷的重視。正是在許多(或許更多)「沒有特別作為」的歷史背景中，一些強而有力的新型態組織與活動團體，才格外引人注目。因此，具創新性、有活動型塑力的歷史，是我們比較熟悉的選題。相較之下，本書許多論述都建立在「沒有」之上，例如薛瑄沒有明顯師承、沒有建構學派、沒有從事書院教育、沒有強而有力的宗族，這些「沒有」的意義，作者是透過與南方更顯著成功的活動對比之後，才能反襯出來。然而，我們不禁懷疑，本書所描述的薛瑄及河東學派的現象，真的是北方學者的選擇嗎？它足以說明南北的差異嗎？如果我們把與南方比較的視野暫時遮蔽，薛瑄與河東學派似乎失色不少。

另外，薛瑄不強調師承的道統觀，是否足以說明是北學的特色，也可商榷。道統觀以宋儒接續孟子之傳，本身即具有跳躍千年的不連續性，從這一點似乎不容易論述薛瑄在觀念上的獨特性。作者強調薛瑄的復性觀與他重視朝廷和官學教化系統密切相關，但是類似的復性論、萬物一體觀，相當普遍存在理學家的論述中，許多南方學者也都有此看法。因此，雖然我很認同作者希望結合薛瑄的思想及其行動來思考問題，也認為就薛瑄個人層次去強調是沒有問題的，但若要進一步從薛瑄的個案推衍到南北學術文化差異，則有所保留。

綜言之，本書無論就史料的豐富性、研究視野的多元與創新、議題的展開與論述而言，都取得相當好的成績。雖然我試著提出一些個人的疑惑，但仍然十分推薦此書，認為它為明代學術史與社會史研究，作出很好的貢獻。

呂妙芬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